

当代
社会学
丛书

中国 特区社会 研究

田森 著



当代社会学丛书

中国特区社会研究

田 森 著

志平同志指正
作
一九八六年夏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生
上
,
区
生

过
大
层
科
国
介
也

学

的
案

责任编辑 许成厚

中国特区社会研究

田 森

中国展望出版社 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安徽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75

147千字 1986年5月 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1—5,000册

统一书号: 3271·034

定价: 1.60元

当代社会学丛书

王佐良

代前言

为建立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而奋斗！

——当代社会学丛书主编田森答《博览群书》记者问

《博览群书》编者按：

近阅中国展望出版社即将出版当代社会学丛书，我们特走访了该丛书主编田森教授，请他谈谈有关这套大型系列丛书的情况，现将他的谈话发表如下：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的历史不过一百四十多年。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当广泛，各派学者给社会学下的定义亦可谓多矣！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知道，一八三九年，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首先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后来，英国的斯宾塞进一步发展了孔德的学说。然而，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社会学都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是合理的永恒的制度，为巩固资本主义秩序而效力。

孔德提出的理论体系极为宏大，它想囊括一切社会现象，把社会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包罗万象，把一切现象都囊括进去，更不要说孔德的社会学了。

马克思对孔德的东西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指出：“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602页）“孔德及其学派可以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永恒的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369页）马克思极端鄙视孔德，他说：“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36页）“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374页）。

说到底，孔德的社会学企图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回避、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而论证资本家老爷统治的永恒性，所以说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而马克思的社会学是无产阶级社会学，它要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孔德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把社会整体割裂开来，只着重微观的考察。而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

证的，不仅对社会现象进行微观考察，而且还从整体上进行宏观考察。如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存在的现象进行由微观到宏观的考察，从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也为无产阶级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八六七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不朽的《资本论》也是一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的社会学著作。正是这部伟大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和孔德都以研究社会为己任，然而由于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不消说，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孔德的社会学是完全对立的。胡绳同志在《枣下论丛》中对西方社会学所做的一些批评，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孔德把社会学奉之为包罗万象的“皇后”科学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是否可以把社会学理解为研究其他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领域的科学呢？显然，这种观点也是不妥当的。

就拿人这个研究对象来说，许多科学都要研究，但社会学对人的研究，比其他科学有更深的层次。如果说，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的话（即作为劳动者的人，消费者的人和管理者的人），那么，社会学对人的研究就更为广阔。首先，它要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为此，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问题均应探索；其次，它要研究参与生产活动、消费活动和管理活动的人；再其次，它还要研究精神的人，即人的思想、行为、道德、理想等。所以说，不能把社

会学的对象说成是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东西。把社会学夸大为包罗万象的“皇后”科学是错误的，把它的研究对象从一个极端移到另一个极端也是不相宜的。

—

究竟什么是社会学？

的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当多的。有人说，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此说未免失之笼统。有人说，社会学就是人学，此说亦未必科学。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社会。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都需加以认真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它并不能代替对于社会现象的具体研究。应当说，历史唯物主义着重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中去研究社会。但这几种关系并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生产关系就意味着全部的社会关系。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确有广阔的研究天地。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发展阶段都必然有它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需要探讨。可以说，研究昔日社会的各种问题是历史学的任务，而研究当今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途径，乃是社会学的任务。简而言之，新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社会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内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不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

着矛盾，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现实与可能、宏观与微观、当前与未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职能的强化与弱化等等，都存在着矛盾。而矛盾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前进。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新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承认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良性运转。新社会学既要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宏观研究；又要对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即微观研究；还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过程。就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吧，它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它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表现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但在阶级内部也还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而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这些矛盾，舍此而外，别无他途。纵然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绞尽脑汁，提出各式各样的方案，也都无济于事，充其量只能缓和一下矛盾，如此而已。

西方社会学本能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阶级的局限性使它永远不会把社会发展视为自然历史的过程。不消说，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症结——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敢触及的。所以西方社会学者只好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些调查研究，几乎把视野只限制在有微观价值的琐屑问题上，借以缓

和矛盾，延续资本主义的统治。

当然，西方社会学家在理论上也不是一点创造都没有。他们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明了一种科学技术统治论。他们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一切发达国家，不管其社会政治制度如何，都卷入世界性的工业化过程，在“大工业化的绝对要求”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成就的压力下，正在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互相接近（合流），这种接近归根到底将把全人类引向“大众消费”的和“普遍幸福”的社会。他们极力描绘的是，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的社会，代替当今资本主义的，将是学者、经理、科技人员等的统治，而非共产主义。西方社会学家把这种观点描述为生产领域中权力根源的“移位”，即所谓权力由“资本”移向“组织起来的知识”，妄图用这种手段来冲淡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不治之症。

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具体问题上，而且越搞越繁琐。可以说，今日西方社会学家每每钻进一个非常狭小的题目中就死抱住不放，一经钻进死胡同，就走不出来，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由于题目过分狭窄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西方的社会学家，为了给自己寻找出路，甚至把研究个别社会现象的东西也称之为一种社会学。于是这种社会学、那种社会学都应运而生。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门社会学。社会学简直成了一种公用的牌记。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应用社会学和它的分工，我们反对的是西方某些实用主义的社会学家，把自己调查研究的任何一个狭窄的领域都称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忽视了社会本身乃是一个整体，忽视了同

整体社会的有机联系。

战后日本的复苏也为它带来了社会学的迅速发展。然而，不管是欧洲的社会学也好，日本的社会学也好，都没有摆脱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可以说，美国社会学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学的一面镜子，一个浓缩的影子。

二

在苏联，社会学也走了很多弯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于是，当时就产生了一种看法，仿佛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其实，只要是一个社会，就都会有它的问题，只不过问题性质不同，大小有异而已。

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是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的。苏联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在他草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决议草案中就写道：“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列宁全集》第27卷378页）在列宁的倡导下，二十年代苏联社会学家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社会调查，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心理状况都做了一番认真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内局势有了好转。这时，斯大林却从理论上否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他写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应”，直到他晚年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承认存在矛盾。既然斯大林当时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

盾，他又怎能去承认以研究和解决社会矛盾为己任的社会学呢？

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苏联社会学遂被打入冷宫。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苏联的思想界才略为松动了一些。加之，苏联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引人注目，终于促使苏联学者又把社会学提上了日程。一九五八年，苏联首次组织了苏联社会学学会。这一群众性的社会学团体，没有官方的认可，是不可能成立的。不消说，它为此后苏联社会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苏联社会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后，又用了约二十年功夫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苏联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同等起来。当年主持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工作的伊利切夫就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学。”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研究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它怎么可能把全部社会生活的研究都纳入自己的轨道呢？为了弄清两者的关系，苏联学术界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尽管如此，进入七十年代后，苏联还是改头换面地大力引进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加速对具体社会学的研究。在许多领域的研究中（如婚姻家庭、人口问题、劳动组织、青少年问题、闲暇时间的利用等）都取得了一些成就，受到苏联有关方面的重视。然而，如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学都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苏联理论界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使命，是研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及其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同时它也负有理论研究的任务。可惜在这方面苏联社会学远未将宏

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大家知道，马克思经常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出发，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高度来考察。譬如，他发现英国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五四年间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快，而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八年虽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扩大了自己的财富，可贫困现象则不见减少，而犯罪率的增长甚至比人口的增长还快。马克思认为，象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些腐朽的东西。马克思把犯罪率增长比人口增长还快这一微观现象，提高到制度内部腐朽的高度来考察，这就让人深刻地感到资本主义内部犯罪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马克思也曾对巴黎的大量自杀事件做过调查研究，借以嘲弄资产阶级说的“现有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谬论。当然，有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造成它们的根源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渊源于许多复杂的原因。所以我们断然不可硬套上述公式，但也有些社会问题同我们制度的不够完善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它还有待于不断地发展。把一切微观现象提到宏观的高度来认识，有助于我们树立牢固的不断改革的思想，让社会主义制度永葆革命的青春。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现在，才不过六十九年的光景。即使从运动角度考察，从一八四八年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也才经历了一百三十八年光景，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仍然不过是短暂的一刹那。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事物，需要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来不断地完善和巩固它的制度。那种认为社会制度建立的问题解决了，具体的社会问题无关宏旨，而不去考虑如何日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对于不断进行改革是有害的。其实，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一

系列措施，不断地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规章、制度等进行改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总之，苏联社会学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观点以后，是逐渐恢复起来了，然而只是改头换面地吸收了许多西方的东西，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体系。迄今为止，苏联连一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教科书都没有，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反映。

三

社会学传入旧中国，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情。其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之际，改良主义者害怕革命的到来，他们呼吁社会的改良。一九〇三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翻译出版，引进中国，正是为了适应社会改良的需要。至于帝国主义者，更是热心把西方社会学输入中国，妄图使它在阻挡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当时的一些教会大学成为他们传播社会学的重要阵地。西方社会学的输入对中国的思想界起着一种腐蚀剂的作用。有人在看了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后，便大肆鼓吹和平和改良的好处。在一九〇四年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有人著文说：“现在还有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说和平的好处，看见激烈的人便说他不晓得进化的层次。”由此亦可见西方社会学引进中国后所起的作用。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社会学号召了解社会，使得不少学西方社会学的人在了解了社会后起来反对统治阶级。当年的许德珩教授和雷洁琼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随着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也有一批抗衡西方社会学的力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李大钊、瞿秋白等运用社会学进行各种社会调查，把它作为配合革命斗争的武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陈翰笙、张稼夫、孙冶方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农村调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李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社会学大纲》，更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至于在解放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更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旗帜。他在调查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等著作是光辉的社会学文献。于光远等人在四十年代所作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也有相当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在旧中国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继承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衣钵的旧社会学。然而，社会学两种力量的斗争却是不断存在的。革命的力量运用社会学为武器，也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

全国解放后，我们本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根本改造社会学，使其为我所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终于也步苏联的后尘取消了这门学科。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制度问题解决了，绝不等于其他社会问题都解决了。要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必须对具体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并把具体问题的微观了解同社会的宏观考察结合在一起。所以，迫切需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学，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它既不同于西方和苏联的社会学，又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学，而应当是一门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

这里的中国特色至少包含着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它诞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度里；二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底子上取得革命胜利的。前者说明它同西方社会学的诞生的背景不同，后者说明它与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学的背景亦有异。不同国家的社会学，由于各自的背景不同，使用的理论、方法也必然有异，甚至同一问题的调查问卷，由于各自国家情况的差异，也不得不有所不同。同是社会主义社会学，苏联的社会学不可能被移植到同处欧洲的匈牙利或者南斯拉夫，更不要说中国了。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学的情况加以认真的研究，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摒弃其中无用的东西，批判其中错误的东西，借以不断发展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而断不可采取“拿来主义”。照搬是绝不会有前途的。我们必须从我国四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各种社会矛盾，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所谓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邓小平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要想能有所作为，就必须循此方向前进，努力探索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新课题，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不消说，新社会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它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所以它能不怀偏见地正确认识社会现象，为了解社会、变革社会而服务。

最近费孝通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题为《重建社

会学的又一阶段》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就中强调的要警惕两种倾向的意见，可谓切中时弊，对此我们亦深有同感。让不懂得社会学，甚至对历史唯物主义亦少有了解的同志来领导社会学研究工作，这对社会学这门迫切需要加强领导的学科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剧。我们相信，为三中全会精神所武装起来的社会学工作者不会长期容忍这一不正常的现象，而必将冲破关系网把这场悲剧的帷幕早日拉起来。我们同样相信，中央机关在这方面将起表率的作用，会有足够的魄力排除各种关系线条的干扰，把不适合领导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坚决调离，以利于社会学这门极需扶植的科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至于学社会学就一定要出国留学，绝不是有出息的社会学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我们深知，我们社会学工作者面临的任务是极为艰巨的；然而我们也完全相信，我们发展的道路又是极为广阔的。

亲爱的同志们，献出你们的热情和精力，让我们共同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神州大地上努力耕耘，去迎接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的美好的未来吧！

五

当代社会学丛书是一套大型的社会学系列丛书，希望能为建立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它既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又重视社会学的应用方面；它既要为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初步体系而努力，又绝不忽视对各种具体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成果的介绍。它提倡从宏观角度、微观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未来角度、变革角度、文化角度、科学决策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社

会，以便为变革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决心要通过对新社会学的不断探索来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为了建立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我们准备从下面三个方面陆续出版一些较有份量的学术著作：

（一）理论方面：

我们深切地感到，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殊非易事，更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不仅需要时间，也还需要经受实践的不断检验，而眼下条件似不成熟。所以，我们并不急于出版社会学原理一类的体系性的大著作。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一种比较严肃的态度。我们宁肯首先多出一些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论述社会学某一方面的专著，以便逐步地为建立新社会学体系打下一些扎实的理论基础。诸如探索社会良性循环，社会结构，社会控制，阶级分层，科学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文化传统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改革与观念的变化，社会组织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科学决策，社会发展预测，精神文明建设，科学的人际关系，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管理比较研究等问题都是应当受到重视的。我们主张既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勇于突破马克思主义个别过了时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新，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也重视出版一些研究西方社会学著作的专著。最近，我们组织的对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写的《第三次浪潮》的批评，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评〈第三次浪潮〉》一书即将由我们出版。我们还计划出版一些评介当代社会学思潮的著作。我们主张，新社会学主要应研究社会现状，但也不应排斥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我们准备组织作者同历史学家合作探索中国封建社